

世界气候的国际政治学分析

曾品元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法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文章通过对气候政治的生成原理考察得出,气的剧烈变化尤其是温度的变化,使得由气而生成的气候成为当下国际政治的首要议题,然后通过考察气候政治的历史,系统地论述了气候跟国际政治的紧密联系。最后,通过对气候进行爱因斯坦式的哲学玄思,试图从哲学上为各国政要、国际组织、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及一切有研究兴趣的同僚提供思想上的启示和路径,并明确指出,如果人类真的要直面气候的话,要面对的必然是气候对人类全方位的影响,而不只是面对气候变暖对人类的影响。

关键词:气候;气候政治;国际政治;大自然;哲学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0)01-0031-08

通天下一气也,这一中国古圣通过直觉或想象而探究到的自然现象,原本只是文学^①或医学^②用语,但由于其内在的自然哲学含义^③,即便是在科学、技术、经济和政治等极为发达的当今世界,它的哲学指导价值仍如太阳高悬,光耀万丈。就此,笔者借助这一哲学思想,对有“当今国际政治首要问题”^④之称的气候政治进行国际政治学分析,其目的在于为各国政要、国际组织、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及一切对该问题有研究兴趣的同僚提供思想上的启示和路径。

一、气候政治的生成原理

人类思想最精华的部分多来自思想者对天意的理性认知^⑤。气候与政治的内在联系不是人类的发明,而是人类的发现,是人类的理性对天意的认知。发现有经由经验观察而得者,有经由科学实验而得者,有经由理性思辩而得者;经由经验观察而得者,往往明于结论而昧于论证。经由科学实验而得者,往往密于论证而疏于结论;经由理性思辩而得者,则往往结论明确,论证详尽。“气候政治”的发现,东方(特指中国)倾向于经由经验观察而得,西方倾向于经由科学实验而立。以当今典型学术方法而言,两者利弊分明。东方得出了“通天下一气”的可靠结论,但缺乏让人信服的学理论证;西方则以海量的实验数据和分析图表^⑥,详尽论证了气候变暖必因人为的“科学”结论。遗憾的是,西方的所谓科学实验如放到大自然的整体中去进行中国古典式的哲学思考,便会发现那只不过是欲研滴水以知大海,欲究片物以知昊天。

收稿日期:2009-12-03

作者简介:曾品元(1966-),男,湖南衡阳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国际政治学系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法研究。

①《庄子·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故曰通天下一气也。《庄子》无疑是典型的文学著作。

②《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黄帝内经》无疑是典型的医学著作。

③《黄帝内经》和《庄子》都是非典型的哲学著作。

④ 举凡当今重大国际政治活动,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国际组织层面或者政治要员个人层面,气候几乎都成重要或主要议题。

⑤《黄帝阴符经》有言: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⑥ 仅就 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7 年的初步评估报告由 2500 多位科学家共同完成便可想见。

气候政治的生成原理一语到位的东方式表达就是:通天下一气。既然通天下一气,则大自然是气的大自然,人是大自然的人也即人是气的人,而政治是人的政治。这样,政治以人为媒介,与气(候)就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

大自然的人必然要求人生于大自然,活于大自然,归于大自然。离开了大自然,人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人不存在,政治就不可想象。所以,政治从其本原上说,就不是处理人与人之间或由人所组成的集团、政党、民族、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而是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⑦。气候与政治的本质联系,无论东西方,人类先民都有觉察。就古代西方而论,有“科学之祖”之称的政治家泰勒斯^⑧,就依据他的“万物有灵”自然哲学理论,直观而非思辩地觉察到政治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就古代中国而论,先秦时期几乎所有的政治哲学大家如周公、老子、庄子、孔子等,都完全服膺天地人三合一的自然理论。汉代大儒董仲舒则通过《春秋繁露》系统而精细地论证了天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其他几乎所有古代民族,都可从其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中窥视到大自然对政治的先验影响。时间流逝到全球化时代,气候(大自然)因其对政治的根本性影响而大张旗鼓地走到了国际政治的前台。那么,气候对政治的根本性影响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由于气候只不过是气的变化(表现为温度冷暖、流动快慢、成分比例等变化)^⑨,所以,研究气候政治的生成原理,就必须从自然哲学上研究气对人及由人集合而成的人类的内在影响入手。

政治是人的政治,它有两方面的内涵。其一,政治是人的产物。动物或植物如果有政治,那也是人赋予的,而不是它们自身有人一样的自觉的政治意识^⑩。其二,人是政治的目的和归宿。正如“道不远人,远人非道”一样,政不远人,远人非政。具体而简明地说,政治就是人对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等自然属性和社会伦常的合天意(即合人性)的维持或有效安排。政治的源点并不带有阶级性,它的阶级性只是政治在阶级社会里的一种表现形式。在阶级意识较为浓烈的时代或地

区,政治的阶级性有时是形而下政治的基本和核心形式。但就形而上的政治而言,政治的本质属性恒定是与阶级无关的。否则,无阶级的社会里就应该无政治了。所以,政治的本质属性就应该是它的自然属性,即处理自然同人(人亦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关系。这也就可以解释说明为什么古希腊及中国先秦时期的政治思想都来自自然哲学家。由此可以认为,举凡自然中的一切,如果它极大地影响到人的基本生存和生活时,都必成为政治行为的基本内容,是其他一切基于此之上的政治行为如政党、选举、政制等的发生条件。这意味着,如果人跟自然是和谐相处的时候,人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政治关注的核心内容和主要内容。但当人与自然不和谐并演化到人与自然严重对立时,人事就会立马让位于天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毁灭性的天灾面前,人事的政治冲突无需谈判、妥协、契约等,往往瞬间就让位于天事冲突。通天下一气。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等基本行为莫不与大自然紧密联系。如果把大自然的地球部分按科学常规分为五个圈层的话,则首先,大气圈层本身直接影响到人的基本生存和生活。就人的生存而言,“人以天地之气生”^⑪,无气则无人之生命。就人的生活而言,由于气有清浊、强弱、顺逆、厚薄、沉浮、缓急、舒结、静躁等变化,则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等莫不有相应的变化。诚如《黄帝内经》所言,“苍天之气,清静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失之则内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散解,此谓自伤,气之削也”^⑫;其次,生物圈层、水圈层和岩石圈层一方面直接影响到人的基本生存和生活,另一方面它们自身莫不深受大气圈层的影响,这又致大气圈层间接影响到人的基本生存和生活。这就足以说明,由气的通天存在并由气的变化而形成的气候是人及人类一切活动的先决条件。如果说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的话,那么气就是

⑦国际政治直到最近数十年才将气候、环境等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尤其是最近几年将它上升到第一国际政治高度,这并非说明气候政治因时间上的晚到而处于政治序列的末端。恰恰相反,这正说明气候政治处于政治序列的首端。因为人们最先被觉察到的,往往不是事物的现象,而是事物的本质。人们只有觉察到事物的本质后,才能够对包含该本质的事物进行命名。唯一一事物被命名了以后,人们才可能对该事物进行研究。而事物一旦被命名之后,人们往往就停留在事物的概念上,容易缺乏对事物的实体有直观的认识。只有在现象的东西完全表现完后,才在某一特定机缘下,由某人和某些人通过种种现象而对该本质的东西进行充分的论证。也只有依据充分的现象,人们才能信服为某人所论证的事物的本质。所以,人们对事物的本质往往经由直觉而获得,经由现象而论证,经由论证而确立,经由确立而掌控。

⑧泰勒斯(公元前625年?—公元前547年?)是古希腊第一个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爱奥尼亚学派的创始人。

⑨《黄帝内经·六节藏象论》:“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一年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各气各候都其自然特征,合称气候。

⑩《庄子·齐物论》:物谓之而然。

⑪《黄帝内经》之《素问·宝命全形论篇第二十五》。

⑫《黄帝内经》之《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

经济发生的先决条件。没有气或者气的天然状态^⑬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经济就是不可想象的。没有经济,人就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人,政治就是不可想象的。是以,政治是人的政治,人离不开气及气候,政治不能不受气候的影响,气候政治由是生成。必须在此特别指出的是,气候变暖是当今西方一些国家将气候由科学过渡到政治的始因,但气候政治绝非就是气候变暖。

二、气候政治的历史考察

就气候政治的源而言,它非常久远。地球上任何一个民族(非国家),无论其历史的短长,都在其初期即自觉不自觉地凭直觉感知到了气候与政治的天然联系,这从各民族的自然崇拜和政治祭祀中可以得到印证。就气候政治的流而言,气候政治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正式进入国际政治议程^⑭。科学范畴的气候科学转化为国际政治范畴的气候政治,其标志是影响国际政治发展演变的几大要素都明显并直接地介入到气候领域。这几大要素分别是国家、国际组织、传媒和个人^⑮。

其一,国家。国家是国际政治最基本的行为主体。国家一旦以其政治身份介入到国际社会某一领域,某一领域就立马被政治化。国家为什么要介入气候从而使气候从自然科学演变为国际政治呢?这是国家基于权力、利益和道义三方面考虑而形成的。从权力方面说,根据德国地缘政治学鼻祖拉采尔的理论,国家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成就主要就是看一个国家能否增强自身的权力。现实主义宗师级人物摩根索也承信这一学说。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几乎所有大腕级政治人物都信奉这一学说。在传统的基于经济、军事、宗教、文化、资源、位置、人口等作为增强或彰显权力的手段都开发完毕的情况下,气候以其无与伦比的涵盖全球利益并以完全超乎传统因而可被最广泛接受的道德理念而为各大国政要所青睐。截至目前,首先开发并主动运用气候权力的国家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这是由它们本身发达的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并由此而导致的认知水平所决

定了的。然后意识到并被动运用气候权力的国家主要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墨西哥和巴西等欠发达国家。这是由它们本身欠发达的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并由此而导致的认知水平所决定了的。其他国家则多是大国气候权力角力时作用到自身身上时才作出的站队式反应,亦可理解为增强或彰显国家权力的一种方式;从利益方面说,根据西方任何一派经典的国际政治理论,国家在国际社会里都首要并永恒地谋求国家利益^⑯。由于将气候国际政治化并大力运用气候权力谋求国家或集团利益的行为始于西方实力大国,所以,凡参与全球气候权力角逐的国家,无论其民族传统、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政治理念如何,都竞相大打气候牌来谋求自身理想中的利益。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等来说,由于其本身高度发达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它们谋求的经济利益主要体现在对全球自然环境的严格保护和发达的环保技术高价转让。对于欠发达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来说,由于其本身欠发达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它们谋求的经济利益主要体现在对本国自然环境的充分开发利用和希冀发达国家能以合理价格转让发达的环保技术。对于非洲、南美洲、南亚那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其本身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未发展到能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程度,它们谋求的利益只是在大国进行气候政治角力时它们本身有政治身份价值而获得的经济利益上。无序的国际社会里,任何一场新且大的政治较量,都是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重新布局,都会导致力量并进而导致利益的转移;从道义方面说,国家社会里的权力和利益争夺,无论其多么地赤裸和直接,都从来不会扯下道义的幌子^⑰,尤其在当今所谓的由国际法所规范的文明国际社会里。欧洲以其在科学革命以来在科学领域里的超凡绝伦的杰出成就并由此而延伸出的冠绝当今的环保技术而睥睨世界。所以,它在因全球气候变暖而衍生出的气候国际政治问题上,历史地派生并现实地表现出一副手握真理、君临天下的架势,以至于象美国这样的超级巨无霸都深感其在道义上受到的压迫。美国最终拒签《京都议

^⑬地球是自足自恰的,气的温度高低、流动快慢、成分构成、垂直厚度和密度大小等都天然地满足人及人所赖以生存的其他有机生物甚至是无机物的生存。

^⑭气候政治变化的政治化历程,可参看李东燕《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若干政治分析》一文。《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8期。为简明起见,本文对气候政治的历史考察,时间只选取在气候政治正式进入国际政治议程之后。

^⑮影响国际政治发生演变的因素有很多。举凡对人产生重大而长期影响的因素,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对国际政治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只是依据国际政治理论的常理,选取能说明某些问题但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的几个要素对主题加以论述。

^⑯中国的传统政治理论并不总是经济利益优先并永恒。中国先秦时期经典的国家利益观是利义的统一或义在利先。比如,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荀子·大略篇》:盛世重义,乱世重利。国家是人的国家,人际关系如此,国际关系亦如此。

^⑰有关权力和正义(道义)的充分论述,可参看美国学者沃尔夫的《权力与正义》一书。白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

定书》,完全不能排除美国明以科学和经济为借口^⑧,暗怀从道义上反制欧洲的意图。至于象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虽有科技和经济实力但无大的国际政治影响力的国家,以道义为旗而争气候权力,则无疑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在新的国际条件下的一种现实反映。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则在应对西方的道义政治大棒时,明确而策略性地以“在减贫中减排”为道义主张。所以,国际社会就气候政治达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之共识,正是世界各国在权力、利益和道义上集中妥协的结果。

其二,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迅速向世界政治转化的过程中,国际组织起着粘剂般不可或缺的作用。尤需注意的是,虽然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但国家的数目只有200余个,而国际组织的数目多达上千个,几乎涵盖了所有较为重要的全球性问题或地区性问题。所以,国际组织虽然作为单个的个体,其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多不及主权国家,但在人类正快速走向全球一体化又还没有完成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国际组织有时会呈现出超国家力量的力量。即使就单一国际组织而言,有些国际组织因其成员国参与的最大广泛性和国家主权让渡的政治严肃性,它在某一具体领域里所彰显的道义权力也会大过国家,从而使一些国家在国际政治的某些事项上屈服于国际组织。比如国际奥委会和联合国大会等国际组织。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⑨也是类似的国际组织。由于通天下一气,所以,该组织就其理论上的应然成员国数目而言,应该是全球所有国家共同参与。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目前,联合国成员国和世界气象组织成员国都是IPCC的成员,都可以参加IPCC及其各工作组的活动和会议。这就从国际政治的民主性上保证了气候政治的全球参与性,进而使得由此而由IPCC形成的决议在执行上就具有了全球广泛性,气候治理的跨国性也因此有了国际组织上的可靠保证。但是,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任何问题一旦政治化,就无可避免地失去了纯粹公正,权力和利益就必成竞逐的焦点。以《京都议定书》为例,它原本是全体成员国共同意志的产物,在理论上体现了最大的公意,但作为IPCC成员国的美国,却能凭借其自身强大的自主实力,硬是拒签《京都议定书》,还想另起

炉灶,以《晴朗天空与全球气候变化行动》为蓝本,意图建立一个惟美国马首是瞻,从而构建起一个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的气候政治组织,以取代欧盟在气候政治领域里的主导地位。显然,由于IPCC历史地形成的强大框架性力量和道义力量,美国的意图根本无法实现。所以,虽然由于国际政治的固有缺陷而使国际法或国际组织的某些决议不能强制执行,但不是真正的强大国家或是真正的无赖国家,是不敢轻易同IPCC及其决议背道而行的。这从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和2005年《京都议定书》签署以来,其在国际社会里得到各国言语上的广泛支持和行动上的密切配合可以得到印证。

其三,传媒。在一个日益开放而民主的社会里,民众的各种诉求越来越要求并现实地得到公开的表达和传播。传媒在这当中起着网络路由器般的作用。有人甚或指出,传媒是除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这话虽有夸大之嫌,但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传媒对当今各种国内、国际事务的广泛影响力和深度渗透力。因为传媒能够在民众中形成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对社会无时无刻不发挥着强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基于这种原理,带有明确本国国家利益取向的传媒就广泛而深入地介入到了国际政治领域里。如果说国家虽也直接而赤裸地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而在国际舞台上牟利的话,那它多少还要受到一些比如国际法或国际组织或人类普遍道义的制约。可传媒由于其形成的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所以,它可以十分巧妙地以各种掩人耳目的方式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地在国际舞台上为本国或某一利益集团牟利。世界上很多小国出于无意识或微实力方面的原因,根本就没有可能借助传媒这种手段来维护或扩张本国权力,这就给那些既有实力更有意愿和意志的世界政治大国提供了广阔的政治和利益舞台。比如,一些西方大国可以通过其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传媒,以科学的面目和科学的程式,将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归之于它在政治上想打压的国家。被打压的国家多因没有相抗衡的国际影响力的传媒作反击手段,于是,本身也并不很干净的面目在道义上就被传媒严重扭曲地抹黑了。继之而来的便是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强权政治或国际组织的道义谴责。传媒于是

^⑧美国认为气候变暖是一个科学议题而非科学结论,贸然采取温室气体排放将严重危及美国经济。转引自《全球气候变化与大国责任》,载《了望新闻周刊》2006.5.29

^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是一个政府间科学技术机构,是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署(UNEP)在1988年共同建立的,包括三个工作组:第一工作组为科学工作组,负责评估可获得的气候变化的科学信息;第二工作组为影响工作组,负责评估气候变化产生的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第三工作组为响应对策工作组,负责制订有关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的响应策略(后来第二、第三工作组的职责有所调整,分别负责评估影响与对策,和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方面)。该组织由于国际政治的介入,其所作报告大多反映欧盟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其所引科学文献和科学观点大多也来自欧盟,故它已一定程度上已沦为欧盟一些国家的政治工具。吴金勇、刘婷:《气候政治》,载《商务周刊》2007年5月20日。

再接再厉,推波助澜,还俨然以一个国际社会里负责任者的形象自居,给国际政治文明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当然,由于通天下气,气候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事关人类的大事,很多时候传媒在这其中也起着很正面的积极作用。但当气候由自然科学变为国际政治时,传媒就一定带有国家立场。这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况和传媒本身的生存需要所决定。

其四,个人。从理论上说,一个能在国际政治领域里起作用的个人,绝大多数是在国际社会里有能有位的人。一般的无名小卒是无力对国际政治产生哪怕些许的直接影响的。从实践上说,如果一个人能在国际政治领域里产生直接影响,哪怕是不大的直接影响,就可以反过来确证他或她是一个在国际社会里有能有位的人,这进而可以让原本就有脸有面的人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更多的经济利益或更高的道德荣誉——这取决于当事人的价值理念和人生目标。由气的变化而形成的气候必定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当然包括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政治生活。假使一个人有着超越自我的高级追求,那么,从理论上分析,这样的个人只要符合以下几个条件,他或她就一定可以在气候政治里找到实现其人生目标广阔而现实的政治舞台。其一,他或她必须是生活在一个气候政治时代里。国家、国际组织或传媒都对气候政治都有高度的关注,他或她遂得以顺势而为并事半功倍。其二,他或她必须是一个介入气候政治领域之前就有高的政治知名度。一个只具有低的政治知名度或高的科学知名度或高的学术知名度的个人,是难能通过气候政治成就自身的。其三,他或她必须充分认识到气候对人类社会有重大而永恒的影响,并怀着宗教般的虔诚投身于气候政治事业。其四,他或她必须是一个对事物只有片面认识的人,并坚信片面的认识是人类前进的方式。假使一个人对事物有“道”的整体的认识,就很难有足够的热情对气候政治事业投入传教士般的努力。目前,国际社会里想在气候政治里成就自身的人,典型的当数“曾经是美国下一任总统”^⑩的国际知名政治人物戈尔。他以一部力求生动有趣但并非那么生动有趣的记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而蜚声国际政坛,并因此而获得政治领域里的诺贝尔和平奖。可以肯定地说,想踏足气候政治跳板而攀登历史高台的人,戈尔不是第一个,也决不可能是最后一个。

三、气候政治的哲学沉思

气候政治很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里占据国

际政治问题的首要位置。其理由是,它在空间上比其他任何国际政治问题都来得更广阔,在时间上比其他任何国际政治问题都来得更持久,在政治上比其他任何国际政治问题都来得更紧迫,在经济上比其他任何国际政治问题都来得更根本,在科学上比其他任何国际政治问题都来得更复杂,在哲学上比其他任何国际政治问题都来得更本原。以下对气候政治的哲学式思考,乃是一介书生幼稚但并不可笑的行为。

气候之所以能由纯粹的自然科学迅速演化为带有国际政治内涵的社会科学,并于近期上升为国际社会里主要的政治议题,其原因:一是全球气候变暖,二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产生了严重的甚或是毁灭性的后果,三是这种后果直接关系到国际社会里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及道义旗帜的重新标立。并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一、二是科学研究,三是政治实用。换句话说,西方的气候政治自以为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欧洲一些国家之所以在气候政治上那么自信地在道义上咄咄逼人,不就因为它有科学依据吗?数千顶级科学家队伍,十数年对气候数百上千年历史的科学探索,数千页的科研论文,能不让人觉得它科学吗?可是,科学的研究对象如果包含人在内时,它的正确性就大打折扣。而当政治渗入科学或科学为政治服务时,科学的客观性就丧失殆尽。

让我们对气候政治来予以爱因斯坦式思辩而非爱迪生式实验地进行分析^⑪。

(一)全球气候变暖^⑫

首先,我们讲的气候变暖无疑指的是地球的气候变暖,其他星球上的气候变没变暖并不知道。尤为严重的是,研究气候变暖的科学家们或许根本没意识到有必要研究其他星球的气候变化。于是,科学研究就失去了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这就好比没有参照物就研究运动一样,是物理学常识的缺乏,是不可能得出科学结论的。如果一颗无人居住的星球,其气候也显现出变暖的现象,那地球的气候变暖就铁定主要不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是气候自身周期性变化的表征。其次,即使人类目前因科技能力不足而研究不了其他星球的气候变化,我们凭想象和经验进行类比,也可以得出结论:人类的活动是不太可能导致气候温度单边上升的。其原因是,相对于人类而言,为气所包裹的地球是一个庞大

^⑩记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里戈尔的自嘲兼自豪语。

^⑪科学实验的研究对象是受时空制约的,其研究能力是相对有限的。理性思辩的研究对象是不受时空制约的,其研究能力是相对无限的。故在更大的时空范围里,理性思辩的研究能力应该是超过科学实验的研究能力的。但两者不能互代,只可互补。

^⑫很多知名科学家和很多非科学家身份的学者并不完全接受全球气候变暖这一所谓的科学结论。他们的论证文章繁多,笔者在此并不打算一一引用,有心者可自行查找。

的天造物。历史证明,人类在这样的天造物面前,是没有能力改变它的基本构成和基本运动形式的。我们可以拦黄河水建坝,但我们不能止黄河水不流。我们可以凿珠峰为路,但我们不能压珠峰不耸。通天下一气,黄河、珠峰其形体大小是远不能同气相比的,其对人的承受能力也是远不能同气相比的。人连黄河和珠峰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还能改变无所不在的气吗?再次,即使科学家们用最精密的科学仪器,极精细地分析出导致气候变暖的气体如二氧化碳等的变化,也完全不能说明气候变暖就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所引起的。因为影响气候冷、暖变化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多到远远超出目前人类的科学把握能力。想象一下,茫茫太空中地球只不过是一颗微粒,这颗微粒理论上会受到太空中所有物质或反物质的影响。人类目前对太空了解多少?如果不说太空,对地球及地球上的气候有深刻影响的银河系又了解多少?如果不说银河系,就说人类能直观感觉到的太阳系,除太阳本身对地球气候明显而复杂的影响外,其他星球对地球气候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人类对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月亮对地球气候的影响都不能全面回答的话,那就根本谈不上回答其他星球对地球气候的影响了。即使回到地球本身,一方面,地球既自转又公转,自转导致白天黑夜的变化,白天多比黑夜冷,公转导致春夏秋冬的变化,春夏多比秋冬热。所以,它们都会影响地球气候温度的变化。另一方面,地球的地表分布着无穷多样的地貌和运动物,有海洋陆地,有冰山雪原,有高山峡谷,有河流湖泊,有高原盆地,有戈壁沙漠,有草原森林,有公路桥梁,有铁路机场,有港口码头,有厂房楼宇,有飞机火车,有风雨雷电,有火山地震,有赤道两极,如此等等,数不胜数。每一个因素都在影响气候的变化,每一个因素都与其他因素相互影响而无法单独影响气候的变化。人类怎能单凭温室气体的排放就能断定气候单向变暖了呢?如果造物主有意志的话,那造物主的意志就那么容易同造物主所造的人类所消磨吗?

(二)全球气候变暖的后果

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后果,就目前人类经验所能观察到的或为科学研究所能探究到的,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③:(1)南北两极冰川溶化,地球诸多雪峰萎缩。其结果是海平面上升,沿海低地国家淹没,四十几个小岛国消失。(2)出现全球性干旱,陆地沙漠化扩大,森林大火频发,热浪袭击城市。(3)热带海洋珊瑚礁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4)

沿海地区飓风发作更加频繁。(5)墨西哥暖流停止。(6)疾病肆虐。(7)生物物种灭绝。(8)人类灭亡。

现在让我们简明地对以上8点逐一进行哲学式思辩。

其一,无物常驻,万物皆流。南北两极冰川溶化,乃是地球有机体自然表征之一,是冰川有生命的表征之一。科学地说,冰川溶化是人类因技术进步而在有限的时间段里所看到的真实现象。但真实并非就是真理。真实只是一种现象,现象的背后一定隐藏着生成现象的本质,这个本质的东西连同现象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才是真理;哲学地说,冰川溶化只不过是冰川生命的一个阶段,它一定有一个逆溶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如果待到科学进步到一定程度,或者凭现有科学技术水平再观察几十年,或者凭理性去思辩,便一定能真实地显现在人类面前。又假使南北两极的冰川完全停止溶化,则无疑意味着陆地、海洋、冰川和大气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彻底破坏,从而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现象都不可能出现。同理,雪峰萎缩也是雪峰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萎缩到一定程度又会逆萎缩。所以,所谓的海平面上升、沿海低地国家淹没、四十几个小岛国消失等现象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如有小岛国消失,其原因也绝不是气候变暖的结果。如果人类为防止此类事情发生而投入过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其基础不是科学,不是理性,而是政治。

其二,地球出现干旱、陆地出现沙漠、森林发生大火、热浪袭击城市等,都是地球上无论气候变暖还是气候变冷都会经常发生的自然现象。科学在没有完全弄清楚干旱、沙漠、林火和热浪形成原理之前,是断然不能认为气候变暖便是罪魁祸首的。况且,根据任何一事物对它事物的影响都是正反两方面的辩证哲理,气候变暖未必不能使地球出现洪涝、陆地出现绿洲、森林更加茂盛、寒流袭击城市等^④。

其三,笔者在科学上对海洋生态系统一无所知,但据通天下气的至理,热带海洋珊瑚礁生态系统一定会受到气候的影响,但具体有些什么影响,怎样影响,其科学原理本人无法得知。据查,也找不到这方面的科学论文。既如此,奈何“热带海洋珊瑚礁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要归之于气候变暖?科学还是政治?

其四,沿海地区飓风发作是否更加频繁呢?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但同时是一个科学现在还回答不了的问题。人类已知的关于飓风的形成需要三个条件:温暖的水域、潮湿的大气、海洋洋面上的风能够

^③对全球气候变暖后果进行部分基于经验事实批驳的,可参看李有观编译:《全球变暖是一个“大神话”》,载《世界科学》2005年第5期,第25页。

^④正当本文写作进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北半球出现大范围罕见的冰雪冻雨气候现象,好像特为本人提供证据似的。

将空气变成向内旋转流动。这应该是三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而这三个必要条件又如何形成,跟气候变暖有什么样的关系,科学似乎至目前并没有全面回答,甚至连最基本的回答都没有。既如此,国际政治界怎能因此而将气候政治化呢?气候一定会影响政治,但不是通过这种途径来影响政治。否则,药不对症,涉海凿河。

其五,墨西哥暖流是由于墨西哥湾汇聚了北赤道洋流和南赤道洋流的一部分,还接纳了被信风不断驱赶进来的大西洋暖水,使湾内水位比附近海面高出许多,从而使海湾变成巨大的热水库而形成的。墨西哥暖流是世界第一大暖流,其携带的热水水量是世界所有河流总量的120倍。据估计,湾流每年向西北欧海岸输送的热量,每公里约相当于燃烧600万吨煤炭所放出的热量,使西北欧地区的气候变得温暖湿润,冬无严寒——这正是欧洲科学家和政治家担心的真正原因。可是,这种担心从政治上说有其现实价值,从科学上说就几乎与杞人忧天无异了。大自然如此神奇的杰作,难道人类排出一些温室气体就能让它停止?!人类如有这么大的本事,世界上什么事都好办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还不是小菜一碟?

其六,疾病是人类固有的一种属性。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无论寒带还是热带,没有哪一个民族甚或是哪一种生物能免于疾病的侵害。就连地球本身,它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也一样受到疾病的侵害——自然灾害是其表现形式。显然,导致疾病的原因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消除疾病永远也不可能。既如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定,气候变暖会导致疾病肆虐。又假使气候变暖必然导致疾病肆虐,则热带比寒带多疾病,夏天比冬天多疾病。这似乎与我们人类既有经验不合。我们难道不也可以说气候变暖能导致某些疾病灭绝吗?

其七,天下万有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一种生物的灭绝,也许正是另一生物产生的自然条件。比如,地球上恐龙如果不灭绝,人类能否产生还是一个问题。地球有机体是一个充满弹性的天造大系统,某一生物物种的灭绝就如人体一些皮毛的剥落一样,是生物生命里固有的新陈代谢现象。人类如果因为国际政治的权力和利益需要而去阻止一种大而持久的自然现象的发生,那就是逆天而行。逆天而行者,鲜有成功的。基于此,那些基于科学研究、明于政治需要而昧于哲学求真的西方发达国家,如果硬要以气候变暖而致生物灭绝为口实来谋求权力和利益,

那就必定是逆天而行,断难成功。当然,如果人类认识到某一生物的人为延续有其生物学上或文化上的价值并进而采取一些行动,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以气候变暖为理由来获取政治利益,则看上去有些别扭。医生看错病开错方病人服错药而致病情恶化,病人即使不知是医生犯的错而以为是病本身使然,病人固然可悲,但医生尤其可耻。

其八,气候变暖会导致人类灭亡是一切关于气候变暖严重后果里面最为耸人听闻的言论。正因为它最为耸人听闻,所以它显得特别的荒诞无稽。天生天养,天养天杀^⑤。人乃天所生,亦为天所养,所以,必为天所杀。天不灭人,人是无法自灭的。这就像人不灭家猪,家猪是无法自灭的——人就是天的家猪。气是天生的,人是气生的,气不灭人,人无法自灭。鼓吹人类活动排放过量温室气体而使气候变暖并最终灭亡人类自己,科学上找不到任何确证,哲学上找不到任何逻辑,所以,剩下的唯有政治上的借口了。无序的国际社会里,只要有权力和利益的需要,借口总能以貌似合理的形式出现。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

(三)上述二者引起的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及道义旗帜的重新标立

凡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国际政治意义上的气候政治是由欧盟首先发轫的,其名是正的——气候确实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其言却不顺。它的言有两点。其一是2℃问题,即力争使全球平均气温升幅长期限制在2℃以内;其二是限期减排目标问题,即到2020年,使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削减20%,到2050年至少要减排50%,同时要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达到20%。欧盟的这两言,是缺乏科学认知的,尽管它完全是以科学的态度和程式来认知的。通天下气。渺小的人类即便有意竭尽全力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都不可能使全球气温升高2℃,何况无意为之呢?又假使人类的的活动确实使地球气温升高了2℃,则其后果也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大。通天下气。包含人类在内的地球是完全能够承受其自身2℃的温差变化的。所以,欧盟设定此2℃标准,并基于此而采取国际政治行动,是很难使它国在政治和道义上信服并进而在行动上配合的。至于限期减排目标问题,由于地球的单一体性和气的全球流动性以及国际社会里主权国家的地理分割性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理论上可行,实践上则难行如登天。

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政

^⑤《黄帝阴符经》中篇: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其不神之所以神也。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

策和行动的基础。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某些西方大国就气候政治采取的国际政治行动是缺乏科学认知的。或者准确地说,是缺乏自然哲学认知的。如果一场如此大规模高层次的国际行动缺乏科学依据,那背后就一定有其他动力和动机。在无序国际社会里,这种动力和动机很可能就是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这并不排除因气候政治本身的科学学理性而要求人类有责任地共同行动)。可是,一国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追求如果取之无道,则时间一久,就会走向它目标的反面。这是西方大国在谋求气候政治利益时必须加以严肃认真对待的问题。因为国家对气候政治竞夺的后果完全不同于国家对国家间

政治竞夺的后果。国家间政治竞夺是人与人(表现为国与国)的竞夺,其后果有输就有赢。而气候政治竞夺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竞夺,它更多地牵涉到人与天的竞夺。人与天竞夺,其后果是,人要输则人类满盘皆输^②。

如果人类真的要直面气候的话,要面对的是气候对人类全方位的影响,而不只是面对气候变暖对人类的影响。气候政治的生成原理有其学理依据,但气候政治的政治运用将极大地损害这种依据,地缘政治学的盛衰起落已是前车之鉴。让我们理性地将科学归科学,政治归政治,在此基础上,再将气候归政治。

The Climatological-politic Analyses under the Fram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ZENG Pin-yuan

(School of Law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P. R. China)

Abstract: Air fills and connects the whole world. Air generates the climate, thus they are fundamentally related. The dramatic change of the air, especially the climbing of the temperature, had recently made the climate issue one of the princip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opics. Study will be taken on the foundation principle of climatological-politic, and historical review will be carried out on the climatological-politic under the fram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y doing so, the author will try to explore a brand-new thinking-path philosophically which can lead us to the research of climatological-politic.

Keywords: climate; climatological-politic; international-politic; nature; philosophy

(责任编辑 彭建国)

^②《墨子·天志》：“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离，交相贼，必得罚”。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社 <http://qks.cqu.edu.cn>